
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

邓小平

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一日

邓小平同志1988年5月11日为《光明日报》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10周年纪念活动和本报编辑部编辑的《真理标准讨论文集》的题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西光传/邓加荣著. —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11.7

ISBN 978-7-5112-1294-8

I. ①杨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杨西光(1915~1989)—传记 IV. ①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10940号

杨西光传

作 者: 邓加荣 著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武 宁

责任编辑: 田 苗

封面设计: 小宝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段 晖 施凌波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1(咨询),67078945(发行),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

印 刷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本: 690×975毫米 1/16

字数: 235千字

印张: 16

版次: 2011年6月第1版

印次: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12-1294-8

定价: 40.00元



◎ 邓加荣 / 著

杨西光传

《光明日报》登了一篇文章，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……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，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。

——邓小平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 他与“真理标准”大讨论 / 1

早春二月天气 三进中央党校 胡耀邦与思想解放苑地 春雷之声《理论动态》 读书的“四最” 第九、十、十一次路线斗争 总编辑赴任 恩格斯说：“在这种时候从事日报的工作，是一种乐趣。” 改版《光明日报》 精神枷锁“两个凡是” 决胜的一招，是将《实》文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 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 共铸干将、莫邪宝剑 最难得的是“唯一”二字 全国各报万炮齐鸣 “两个凡是”者的诘难 “政治遗嘱” 邓小平讲话说：“《光明日报》发了文章，符合马列主义嘛！驳不倒嘛！” 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长达一年之久的“真理标准”大讨论

第二章 追求 / 55

人之初 私塾馆里 廷堂小学 桃潭风光 杨二府里 芜湖关 恰同学少年 “春泥社” 仰望鲁迅 共产主义 ABC 大公职业学校 在CY旗下 失了学，又失去组织关系 上下求索 北上 世界语杂志 48号座位上的北大旁听生 在范文澜家里 台静农告诉他 强虏叩边 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二·九和一二·一六 雨后复斜阳 彩虹 他又回到组织的怀抱 信仰，永不熄灭的火焰

第三章 西行漫记 / 86

北海接头 北平图书馆里 低吟少帅的诗 西光西行 在车向忱
校长家里 东北军眷属联合救国会 张寒晖与《松花江上》
纪念“一二·九”一周年大游行 受阻十里铺 少师落泪的许
诺 宋黎与学兵队 激动人心的西安事变 东北军的内乱 西撤
甘肃 青年训练班与军官差遣二队 东北军67军的宣传大队
又去东北军49军 在105师师部里 赣东战役败退 军警督
察处

第四章 从红岩村到宝塔山下 / 115

夜行三峡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 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“积
蓄力量，以待时机” 三记者访问毛主席 夺回报刊舆论阵地
路遇熟人 转移到延安 一进马列主义学院 分配到中央统战部
里来 绥米地区士绅参观团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李鼎铭与
“精兵简政”提案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大生产运动 劳动英模
代表大会 下放陇东锻炼 华池县岭南乡 羊疙瘩病 变工互助
改造二流子 办冬学 二进中央党校 去李鼎老家里拜年 延
安的大年之夜

第五章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川 / 147

望黄河滚滚 偷越封锁线 在太行山上 军官教导团与俘虏管理
处 敌工部里新来的女子 能说会讲的教育长 战俘的军阶越来
越高 接管大上海 卢凌回娘家 随军南下服务团 二千五百里
的小长征 《福建日报》社长 “遥控指挥”广播电台

第六章 在复旦校园里 / 173

一位走动办公的校党委书记 除了教育，他几乎没有自己的其他事情 院系调整 复旦人才济济 他与老教授交朋友，也与青年学生交朋友 修建国内少有的化学楼 让一个电工做电光源研究室的主任 让李森科与摩尔根学派并驾齐驱 “一批里出一个，一个再带动一批” 数学出了个谷超豪，化学出了个吴征凯……一个华侨女生写给杨校长的信 复旦的女排与话剧团 奇妙的“伞”字 对贾植芳先生的“一饭恩” 你毕竟还是我的学生 新建原子能系与电子学系 甲种分离膜与原子弹爆炸

第七章 一颗心 / 207

永远萦系在复旦校园里的一颗心 在市委候补书记的岗位上 常溪萍与社教 聂元梓的矛头 牛棚生活七载 被侮辱与损害的生死诀别 凄零冷落的家门 对十年梦魇的深思 再绵兰因 理论务虚会 思想解放无止境 改革，是我国当前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实践 凤阳行 小岗村十六户手印的创造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乡恋 登黄山 《实》文发表五周年 病榻之前 亲情人之将终 一颗终生为着追求真理的心停止了跳动

第一章

他与“真理标准”大讨论

(一)

他站在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办公室的窗前。窗外，北风吹动着尚待返青的杨柳枝条，呼呼作响，柳絮和杨绒都蜷卧在坚固的硬壳之中，无法吐放。墙角和屋檐下面的残雪成堆，中午时分稍见融化的地方很快又被寒风挡住，并在上面覆盖住一层光亮的、像半透明玻璃似的罩子。天边一团团灰黑色的冻云，你拥我挤，覆压在轮廓模糊的远山上面，显得异常的冷漠。街上寒气瑟缩，行人匆匆，一片春寒料峭的早春气象。

他回身走到办公桌前，还没有在总编辑的座位上坐下来，心潮便不由得一阵阵地涌动，他记起了恩格斯的一段话：“这是革命的时候，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。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，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，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。”^①

按说，他早已在这样的职位上，或者准确一点地说，早已在近似的职位上干过，而且不止是一次。先是建国初期于《福建日报》，后来又在上海的《解放日报》，而且，都是在双肩挑的位置上——社长兼总编辑。但今天的情况却是大不相同，不仅仅是由于《光明日报》是国内有影响的、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行的一份大报，不同于地方的省市报纸，而且，更是由于今天处

^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22卷，第89页。

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迫切地需要舆论导向来拨开迷雾，廓清是非，正是亟须呼唤人们解放思想、勇于打破禁锢的时代，是人们在如饥似渴地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，人们的心中，都充满着期待和渴望，充满着压抑和苦闷，都憋满了要走出禁区打破精神枷锁的强烈冲动，满怀着尽快地从梦魇中走出、重塑我们伟大的民族之魂的企盼。用胡耀邦的话来说，这是历史进入一个“新时期”。^①这时，作为全国重要舆论阵地之一的《光明日报》（另外几个是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和《红旗》杂志等），就肩负着重如泰山一般的历史使命。他记起了高级党校临毕业时作为党校副校长，后来又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对他说的话：“我听别人说，你的政治思想强，理论水平高，对宣传文化战线的工作相当熟悉，特别是做知识分子的工作，有很丰富的经验。这次就想给你分配一个新的工作，充分发挥你熟悉知识分子工作的所长，调你到《光明日报》去做总编辑，因为那是一张面向全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报纸。现在北京的报界情况是，四大报刊中的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，积极批判极‘左’思想，大力推动拨乱反正，而《红旗》杂志和《光明日报》却按兵不动。你去之后，要积极地开创一个新的局面！”^②这个历史使命，是他未来之前，便已由耀邦同志那里接受到了。

他是1977年9月26日，从刚刚被解放出来的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的职位上（解放出来后，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）来到高级党校的，那时，离党校开学还有半个来月的时间。

为什么这么早就来了呢？他心中自有一番热情冲动。这得从两方面来说。就他本人的革命经历来说，他这是三进中央党校。前两次，都是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。第一次是在1940年秋，他刚从重庆红岩村青年记者学会的岗位上调回来，一到延安就被选进马列主义学院学习。毕业后，分配到中央统战部工作。五年之后，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亟须派送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地区开展工作之时，又将他留下来送进中央党校。组织上为什么要这样安排

^① 见满妹著：《回忆父亲胡耀邦》，北京出版社，第219页。

^② 参见满妹著：《回忆父亲胡耀邦》，北京出版社，第225页；陈小津著：《我的“文革”岁月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第444页。

呢？因为，革命的实践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革命理论的。组织上也发现，他是一个极为热心于革命理论学习的人，而就他本人的志趣与爱好来说，也是对于这一领域内的革命工作，充满着更大的激情。

另一方面，从这时高级党校非同寻常的变化来说，也对他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，向他发出历史呼声般的召唤。原来，在“文革”期间高级党校是个重灾区，被诬称为“林家铺子”（当时的党校校长是林枫同志），遭到百般的摧残和诋毁，经过了七八年的反复批斗和折腾之后，全部人员都被赶进五七干校，无着无落地等待着斗批散。学校的房屋，大多被外单位占去，校园里一片荒凉冷落，杂草丛生，花残柳败。面对这样一个梁倒圯倾的场面，不负重望的胡耀邦同志去了之后，只几个月的时间，便开创出一个思想活跃、勇于探索、实破禁区、大胆拨乱反正的新党校，开辟了毛泽东主席向往多年、构思极为巧妙、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能够见到的“既有民主，又有集中，既有纪律，又有自由，既有统一意志，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。”高级党校的名声，很快就扬播于天下，成为追求真理、探索真理的人都仰慕向往的地方。今天，在这迷雾弥漫、理论混乱之际，他对于这个新理论苑区便自发地产生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归去愿望，那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因此，一接到入学通知，他便第一个前来报到。而且，只在这里住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便在这个很早就已啼鸣着催更的黎明鸟的地方（耀邦同志去后，为了加强党校理论队伍建设，从中央机关、宣传教育部门和大专院校里抽调上来大批理论骨干，如宋振庭、吴江、王聚武等），立即就有了鸟入群、树入林的亲切感，正如他在10月5日写给远在上海的家人的信中说的的那样：

“综合我这个时期接触到的人，感到对理论问题，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，似乎都有争论。前者问题，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；后者牵涉面太大了，也会影响政治方针，我对这些，都在思考。”

震动最大的，是他从胡耀邦同志、冯文彬同志那里听到邓小平同志几次批评“两个凡是”的讲话。邓小平早在1977年4月10日致华国锋、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中，就针对《人民日报》的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社论中提出

的“两个凡是”，亦即“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”，提出明确的不同意见，说：“我们必须世代代用准确的、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。”而5月24日，在他即将复出之日，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去看望他时，再一次明确地提出：“‘两个凡是’不行。按照‘两个凡是’，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，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‘合乎情理’的问题。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，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，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，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，这样做，不行嘛！”

这些讲话的精神大大地启开了他的思路，拨亮了他善于思考、勇于探索的智慧之灯。原来的困惑和迷蒙，一下子被掀开一角，透亮出瓦蓝的一片晴天。他不禁又把那篇社论找出来重新地仔细辨认，也给家人写了信，告诉她：

“今年2月11日，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那篇社论，最后讲了两个‘凡是’，有人有意见，你可查查那天的报纸！”

1977年10月9日，高级党校正式开学。从全国各地抽调上来的八百余名学员，走进了这所“文革”后第一次复课的马列主义大课堂，分别地编入到省部级干部的高级班、地市级干部的中级班和理论干部的培训班里。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，胡耀邦同志就特别强调地指出，学员们不论是高级班，还是中级班，都要以读马列和毛泽东原著为主，号召学员们认真读懂原著，理论联系实际，独立思考，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问题。一般的来说，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最好方法，而在今天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，就更是如此，因为，这是正本清源、拨乱反正的最好途径。十余年来，“四人帮”一伙骗子把革命理论搅得一团混乱，真马列和假马列清浊不分，泾渭不明，人们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常被颠倒过来，扭曲失真，使许多似是而非的谬论弥漫蒸腾，污染着政治环境和理论空气。

为此目的，胡耀邦组织各教研室集中全部力量，编选了五大本、足足有一百多万字的原著教材，还请来了中央编译局十几位俄文与德文的翻译专家，仔细地认真地核定译文的准确性。因为这几年里，康生、陈伯达也好，张

春桥、姚文元也好，这些骗子手们常常利用译文中的某些准确性不够的地方，投机取巧，拨弄是非，有意制造混乱。例如“资产阶级权利”一词，在“文革”前和“文革”中，一直被译作“资产阶级法权”，于是他们便在这上边大做文章，鼓吹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不断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，因而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的骇人理论。胡耀邦与专家们逐字逐句地核定了这一百多万字的原著教材。

三更灯火五更鸡。杨西光在党校里，手捧着那五大本、足足有百十万字的原著啃读着，钻研着，思考着。其时，他已经62岁，早知老之已至矣，但是，真理在召唤着他，书中的真知在召唤着他，他无法松懈，只能是孜孜不倦地发奋和日以继夜地追求。他在11月10日给家人的信中说：

“到党校学习四十天，粗略统计，已经阅读马列原著及文件有十二万字；笔记、提纲写了五万字左右。高级班部队支部的支部书记，评价我杨西光‘睡得晚，起得早，看得多，想得深。’我说：‘你不要捧我的场。’他说：‘我捧你的场做什么用？你又无权提拔我，重用我。’”

西方一位学者说得好：“作品越好，留给读者思考的余地越大。”^①读马列原著，也正是这样。越读，越联想到十余年“文革”中的许多实际；越读，越思及到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一伙所颠倒了或歪曲了的理论是非；越读，越感到有挺身而出为捍卫真理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的必要。他在11月14日给友人的信中，明确地表示了这种决心：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奋斗终生！多读书，研究问题，写文章。”

春节期间，他到耀邦同志的住处去拜年。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那天耀邦同志很兴奋，留他在家吃饭。饭菜很一般，但谈话却非常开人心窍。

耀邦同志住在高级党校的一座二层小楼里，楼下有一间客厅、一个卧室、一个厨房，他们便在客厅里聊天、谈话，就在旁边小餐厅里吃饭。使他深受感动的是，耀邦同志也是同他那样大年龄的人了，可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忙，不停地思考、议论、筹划着如何把各项工作做好，把被“四人帮”

^① 霍尔布鲁克·杰克逊：《书籍与阅读格言集》，1934年。

“四人帮”的斗争，还比较容易说清楚，但要认识深透，也还不是那么容易，例如关于“四人帮”等人所推行的路线是极“左”还是极右的认识，存有很大的分歧；而最困难的是第九次，即所谓与“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”的斗争。因为，这时强加到刘少奇头上的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三顶帽子还没有摘掉，党中央的几位主要负责人还坚持着“两个凡是”观点，按照这个精神，刘少奇的案子就不能翻，不能动，因为刘少奇的案子是毛主席定的，自然铁案如山，岂容置辩、动摇和反悔。因此，这也就成了一个禁区，党史的路线斗争到此打了个死结，任凭你有多大的解数也解不开，想绕又绕不过去。

惊人的是，胡耀邦凭着超凡的机智和过人的胆识，突破了这个禁区。他巧妙地绕过当时中央那些负责人所布置下的雷区，出奇制胜、柳暗花明地开辟出一条走向彼岸的通道。他就像笛卡儿说的那样：“仅仅具备出色的智力是不够的，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出色地使用它。”

他指示编写路线斗争教材的同志，首先要将刘少奇的问题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问题从性质上区别开来，做出一个是非清楚、黑白分明的界线：刘少奇的问题，是党内不同路线之争，而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，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之争。确认和判断这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原则和根据，一是完整、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，一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。

耀邦同志曾对思想尚未解放的党史、党建教研室拟定的党史教学计划，提出批驳说：“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。不敢从实际出发，而是从文件出发，不加具体分析，照搬照抄。”“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，这是什么论啊！”“要跳出框子！”“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，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。”^①后来，按照胡耀邦提出的这个原则编写出来的教材发给学员后，立时产生了强烈反响，引起一片争论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但胡耀邦仍然是以坚定的信心对人们说：“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，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

^① 满妹：《回忆父亲胡耀邦》，北京出版社，第217页。

误的重大斗争。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，这风还刮得很猛，简直是十二级台风。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，坚持不懈地努力，最后总会取得胜利。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。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，就决不后退，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。”^①

耀邦同志是很看重杨西光的，几次召开高级班学员座谈讨论这份党史教材时，差不多都让杨西光参加。有时即使是少数几个人，例如1978年3月6日那次，只有六个人，也有杨西光。^②

杨西光读到那份不同寻常的党史教材，打心眼里佩服胡耀邦勇于突破难关的智慧和勇气，钦佩他那“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，就决不后退”的刚毅和坚强，他在11月28日给友人的信中说：

“要大力宣传唯物论，甚至要重新来个启蒙教育。这么多年，‘只讲精神，不讲物质’，‘只敢讲精神，不敢讲物质’的流毒怎样才能肃清？我看，就是要大力宣传唯物论。……我痛感主观唯心论、唯我论、唯意志论的祸害和罪恶，一定要剥开画皮，肃清流毒……无论如何，最后我们一定要把真理说出来的！”

11月18日写的另一封信里，更为明确地提出：

“普及辩证唯物论，应该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。”

(二)

因此，当他担任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宣告《光明日报》改版，撰写《为本报改版致读者》的宣言。虽然，这时外面的天气仍然是乍暖还寒，飘忽的风，飘忽的云，不知什么工夫便会吹皱一池春水。当然，问题不只是吹皱一池春水的事，有时甚而还要带来一阵披头盖顶的大雷

^① 陈小津：《我的“文革”岁月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第455页。

^② 沈宝祥：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第69页。

雨来。

例如,《人民日报》提出的一份内部材料,披露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”的六个要点,都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,而是根据康生的讲话,由陈伯达、姚文元直接撰出修订的。其中,关于“全面专政”的提法,也不是毛主席的原话,而是由陈伯达、姚文元写上去后排成了黑体字的。他们矫传圣旨,以假弄真,使黑帮的话竟成了最高指示。想不到,一位权威人士看到这样一份有力的揭发材料后,却怒气冲冲地给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胡绩伟挂了电话,斥责他们像这样的材料,根本“不应该登”。再如,四川、安徽、山西等地试验推行包产到户和恢复自留地与集市贸易等休养生息、挽救饥饿的措施,各报刊刚刚报道,就遭到中央主管农业的某位副总理的连声斥责,说这是在鼓吹“右倾”,搞资本主义,与学大寨对着干,而且还下令要对山西临汾、运城等地的集市贸易进行查抄,弄得农民提筐携篓四处逃避,有人甚至在惊慌措乱之中坠入到黄河里边。又如,刚刚复刊的《中国青年》,只因登了童怀周的《天安门诗抄》和在天安门事件中不顾“四人帮”迫害与其进行坚决斗争的青年工人韩志雄的文章《革命何须怕断头》,就接到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的电话,下令停印停发。

而《光明日报》改版,又何尝不是勇闯禁区与风险万重的事呢?

历史上,《光明日报》本来就是一张面向广大知识分子、以宣传报道科学、教育、文艺、理论为主的报纸,可是,“文革”期间受到极“左”路线的干扰,逐渐地脱离开本色,变成了与一般全国政治性大报无异的、几乎是完全统一版面的一张报纸。它本来是知识分子之家,现在却因离开了本色而使广大知识分子感到“无家”可归。杨西光想起了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提出的“四化”建设“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”的伟大号召,想起了临来时胡耀邦同志在谈话中的一再嘱托,于是,一到任便雷厉风行地着手改版,使之尽快复归于其历史的本来面貌。他在《为本报改版致读者》的社论中,明确地宣告说,今后的《光明日报》,仍将是一张以科学、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报纸,着重宣传报道科学、教育方面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介绍国内外科学、教育方面的动态,大力普及科学知识,努力办好理论色彩和文学

色彩都很浓厚的各个专刊与副刊，而对于国内外一般的政治经济新闻，除特殊重要者外都不刊登。

一般的政治、经济新闻都不刊登，这要拿出多大的勇气，在那个肃杀的冷风还在频频吹来之际！什么叫一般的政治、经济？岂能由你自家界定，而不与周边一些权威报纸核对口径与统一版面？如果这样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在哪一件政治、经济新闻上，便有一顶帽子飞来扣到你的头顶上。而且还不止如此，他以更大的勇气、更大的决心，在各家报纸仍在作为例行公事的时候，率先第一个取掉了报眼上每天必登的一条毛主席语录。由于他的这些果敢行动，上应天时，下顺民心，虽然只是以自己的行动，向周边疾呼了几声，但亦如古人说的：“夫疾呼不过百步，志之所在，逾于千里。”^① 他的几声疾呼，果然收到了异乎寻常的效应。行之不久，全国各家报纸也都相继仿效，去掉了报眼上那千篇一律的每日一条语录的做法。而《光明日报》由于这一改版，面貌立时焕然一新，脱掉了“套子中人”的一身冗装，显出了雨过天晴的气色，清清爽爽，亮亮堂堂，笑容可掬地面向广大知识分子，以致使得首先提出要改版主张的胡乔木同志，高兴地为《光明日报》作广告性的定语：“欲知国内外知识分子情况，请看今日的《光明日报》。”

《光明日报》改版的成功，是对禁区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破，“这在打开‘文革’中把报纸宣传科学知识，认定为修正主义办报方向的禁区方面，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。”^② 这也让杨西光确实地感受到了，也享受到了恩格斯给《社会民主党人报》读者说的那句话，“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”。^③

在高级党校即将毕业，耀邦同志还没找他谈话之前，对于今后的工作去向，他也有过多种的考虑。“文革”前，他一直是在文教岗位的第一线上工作。日夜辛劳，操心费力，不知流了多少汗水，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。那时

① [汉]刘安：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。

② 杨西光：《回顾1978年改版初期的〈光明日报〉》，见《光明日报历任总编辑文选》，第362页。

③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，第22卷，第89页。